

# 紀念余英時先生

夏伯嘉

(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講座教授)

第一次聽聞余英時先生的大名，是在大學四年班李明珠教授（Lillian M. Li）的近代東亞史的研究課。李教授是美籍華人，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，著有兩本專書，研究近代中國的絲織業與中國近代史的水患和治水。有一堂課，李老師談起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，她說：「集傳統國學的大成與西方史學方法於一身，當今只有余英時教授一人。」這句話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，至今還記憶猶新。

大學畢業後，研究所考進了哈佛大學。可惜的是，余先生剛剛離開了哈佛大學的東亞系轉職去了耶魯大學的歷史系。我在哈佛大學完成了碩士學位，因為種種因素，決定轉校去耶魯大學。終於有機會認識有名的華人學者，中國歷史的大師，余英時先生。

在耶魯歷史系博一的新生中，有一位臺灣的同學，已故的康樂先生，後來我們倆人成爲摯友，亦謝助這份友誼，走進了臺灣的學術圈，認識了臺灣這一個迷人的社會，這一塊樂土。

第一次遇見余先生，應該是歷史系的一個茶聚吧！余先生給我第一個印象是和藹可親，平易近人。他跟我聊天，知道我從哈佛轉校到耶魯，特別問我有沒有跟 Myron Gilmore 教授上課。Gilmore 教授是義大利文藝復興史的專家，後來拜閱余先生的自傳才知道年青的 Gilmore 教授竟然是余先生的老師之一。可惜我在哈佛的一年，Gilmore 教授休假，隔一年他就離世，沒有機會向他學習。閒談中，余先生知道我的主修科是歐洲史，特別勉勵我要好好學習。也是後來拜讀余先生的自傳才知道他的父親在美國學習西洋史，回中國以後是我國學術界第一位西洋史專家之一。現在回顧與余先生第一次的對話，才了解平凡的事情，在他的眼中，皆有深層的一面，每一個「現在」都反映了它的「歷史」和「將來」。一個人、一個學者、一個知識人，他的精神包涵的，不單是自己的知識與經歷，亦融匯貫通了一個文化和歷史。余先生曾說：「我在什麼地方，中國文化就在什麼地方。」夫子曰：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」，應該是這一個意思吧！

在耶魯大學的四年，我雖然沒有跟余先生上過課，可是，從他身上與著作學到的，夠用一生了！也許最寶貴的一課是怎樣去做一個讀書人，一個中國知識人。大家在中學應該讀過各種中國讀書人的名言：范仲淹的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

而樂」，張載的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不難想像，讀了這幾句話，大家都以為自己是魯迅，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！心胸澎湃，不屑那些只圖光宗耀祖、升官發財、趨炎附勢的讀書人。

不！我從余先生學到的不是這樣的豪言壯語；我學到的是日常一舉一動、一呼一吸，無刻不是工功，無事不是真實，學習便是生活的規律，思想就是精神的結構。不論是余先生專長的中國思想史，或是我摯友康樂的魏晉南北朝史，或我自己所習的歐洲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史，我們從歷史認識的，是一點一滴的真和實。而這個「真實」絕對不是某一個政權、某一個朝代、某一個強權可以篡改、毀滅的。中國歷史上，這樣的嘗試可多了：秦始皇的焚書坑儒、乾隆朝的文字獄、中共的文化大革命！

余先生的信仰是中國讀書人應有的核心價值；就是余先生一生研究的「士」的儒家普世價值觀，在現世與西方思想碰擊後出現的自由主義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，余先生是「五四運動」精神的承繼人。「科學」與「民主」，五四運動的主要理想，在五四的一百周年之後，只有一個理想實現了。余先生對民主的關懷，大家知道的已經很多，我在這裡只想說一個小事情來反映余先生的人格與學風。

二〇〇〇年臺灣大選，民進黨的陳水扁勝選成為第一個從反對派獲選的總統，結束了國民黨在臺灣五十五年的專政。從一九九二年解除戒嚴時期到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，臺灣大步的走向民主、自由。那一年，余先生很興奮的說，這是中國歷史幾千年來，第一個和平、不流血的政權交替。我知道余先生的政治立場，這句話代表了他對歷史的客觀評論與尊重民意的胸懷。

一位偉大的學者逝世了。紀念余先生的文章記述了他一生對中、港、臺學者的真心關懷，特別是「六四」之後，對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的幫助。我與余先生沒有什麼私交，只是有幸在耶魯那幾年跟他見過面。以後我提名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也是拜余先生之力。他跟我說：「我提名你，完全是為公的，希望你對臺灣西洋史研究的推動作一點力。」離開耶魯後，三十多年只在臺北召開院士會議匆匆見過余先生。煙消人逝，先生作古，不勝感歎！讓這些雜碎的記憶來代表我對他衷心的尊敬與懷念吧！